

张孝祥的禅宗思想及禅学渊源

陈春霞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8)

摘要: 张孝祥的思想颇多禅宗随缘妙悟的成分。其禅学思想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宋代浓厚的禅学氛围和禅宗学说; 二是张孝祥家族笃信佛教的传统。张孝祥与禅宗的重要宗派临济宗的高僧多有交往, 并崇信高僧大慧宗杲的学说。而其家族对佛教有虔诚的信仰, 张孝祥自小耳濡目染, 深受其影响。

关键词: 张孝祥; 禅宗; 思想; 渊源; 宗杲; 家族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5-0723-06

张孝祥(公元1132~1169年),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后寓居安徽芜湖。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参加廷试,被宋高宗赵构亲擢为状元,授承事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因触怒秦桧,其父张祁受到牵连,被诬谋反,下入大狱。不久,秦桧病死,经参政魏良臣解救,其父才得获释。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张孝祥得招为秘书省正字,后迁校书郎、权中书舍人。因遭言官汪澈弹劾,被罢任,虚授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不久除抚州。孝宗即位之后,知平江府,后除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知建康,领行宫留守。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任静江府知府,领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次年被罢免。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再次被任命为秘阁修撰,改知潭州,权荆湖南路提点刑狱。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以显谟阁直学士致仕,不久即病死,时年仅三十八岁。他是南宋著名的词人,在当时的文坛和政坛都享有盛名。宋代诗人王质在《于湖集序》中称:“故中书舍人张公安国,奋起荒寒寂寞之乡,而声名震耀天下者二十馀年,可谓盛矣。”^{[1](382)}

张孝祥出入于儒释两家,兼融两家之思想。他思想中既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功业追求,又不时流露出禅宗随缘放旷、任性逍遥的情怀。而推考其禅学思想之渊源,不但与两宋时期禅学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亦得之于家族传统的熏陶。

一、

仕与隐,是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心中不解的情结,

谢安身居庙堂而心向东山,李白终身抱持功成身退的幻想,都是这一情结的体现和外化。而禅宗的出现,为处于进退矛盾中的士大夫,提供了摆脱人生困境、寻求人生终极的途径。作为佛教彻底中国化了的标志,禅宗在唐代始兴起,因其体悟方式的不同而分为南宗和北宗,北宗讲渐悟,而南宗提倡顿悟。时至宋代,由于南宗体悟的方式更简便易行而为士大夫所普遍接受,遂发展成为佛教中的一大宗派。因之,禅宗文化是宋代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的士大夫不同程度地与禅宗发生着联系,张孝祥也不能例外。北宋灭亡以后,南宋偏安于东南,许多原居于北方及东京一带的禅僧也随之流亡到了东南及蜀地。张孝祥出生、寓居、仕宦之地,到处遍布禅林寺观,是当时禅宗思想及学说最为普及的地区。在张孝祥的作品中,时时可见他出入佛寺,与禅僧谈禅论道的身影。在与这些高僧们的交往中,他学禅、参禅,接受了禅宗的学说,思想也打上了深刻的禅学印记。

许多禅僧与张孝祥交往密切,大慧宗杲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在南宋的丛林中,集结在大慧宗杲周围的士大夫们是最为著名的居士群体。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大慧号妙喜。张公九成字子韶,自为士时已耽释学,尝与妙喜往来,然不过为世外交。张公自以直言忤秦桧,桧既窜斥张公,廉知其素所往来者,所善独妙喜,遂杖妙喜背,刺为卒于南海。妙喜色未尝动。后桧死,孝宗果放还,复居径山。有劝去其墨者,妙喜笑据不答。孝宗怜而敬之,宠眷尤厚,赐金钵、袈裟,與前用青盖,赐号‘大

慧’。”^{[2](34)}大慧宗杲(公元1089~1163年)字晦,号妙喜,是禅宗的重要支脉临济宗大慧派的一代宗师。俗姓奚,宣州宁国(今安徽省宁国县)人。他十三岁入乡校,最早接受的是儒家的传统教育,十七岁受戒,先后依湛堂文准、圆悟克勤。宗杲其人,善以公案话头来解说佛理,接引众生,他完善了看话禅体系,开启了禅宗临济宗的新时代。在北宋末、南宋初的士人中,大慧享有很高的声望。

宗杲一生虽然寄身禅门,却和当时的许多士大夫有着广泛而密切的交往。他早年接受的是儒家济世拯民的传统教育,他所处的时代,又正是汉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代,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斗争一直极为激烈。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到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的前后十几年间,宗杲先是险为金人所俘虏,后随逃亡人群南下,传法于南方各省,备尝逃亡和国破之艰辛。因此,尽管他是空门之士,名义上不染俗尘,但与许多遁入空门、不问世事的禅僧相比,他却又不乏儒家知识分子的气节和忠义之心^{①[3](836-837)}。他将儒家之气节、忠义与禅宗之学结合起来,使忠义报国的政治观念,成为自己禅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破除了士大夫仕隐之间的心结。因此,宗杲的禅学思想,对一大批经历了亡国之痛的士大夫来说颇具吸引力,使众多有气节的忠义之士集结在其周围。他们抨击主和派的主张,表达对国势的忧虑,形成了一股不小的舆论力量,张浚、张九成等人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几位。其中,张九成更是大慧的俗家弟子,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张九成登径山适大慧升座。有神臂弓之语。秦桧秉国。谓讥朝廷。窜师衡阳。……(辛未)大慧移梅阳。”^{[4](669)}张九成到宗杲所主持的径山能仁寺专门参禅,这甚至招致了当权的秦桧的嫉恨,以至于宗杲以方外之身也受到牵连,先后被流配到衡州和梅州^{②[5](11579)}。

宗杲在当时的士大夫中的威望,固然与其忠直和随缘放旷的人品魅力有一定关系,但更多是来自宗杲禅学理论自身的吸引力。理学大师朱熹曾经不止一次地批评陆九渊的理学思想“满腔子都是禅”^{[2](5)},但他自己早年不但曾向宗杲之徒弟谦问禅学佛,并通过道谦之引介,与宗杲书信往还,向其请教禅宗之禅法要义^{③[6](103-107)}。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朱熹赴建宁参加州试,其师屏山先生刘子翥于临行前检查他的行李,结果发现他的全部行装中唯一的书籍竟然就是记录宗杲言语和学说的《大慧语录》。《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详载此事:“朱文公少年不乐读时文。因听一尊宿说禅直指本心。遂悟昭昭灵灵一着。十八岁请举。

时从刘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举业。暨搜其篋。只大慧语录一帙尔。”^{[4](671)}这足以说明宗杲的学说在当时的士人心目中具有独特的魅力。而从宗杲写给士人成机宜的一封信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宗杲禅学魅力之所在,他说:

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但此心与义相遇,则世出世间,一网打就,无少无剩矣。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7](418)}

佛教最初是提倡出世修行的,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一直信奉的儒家思想是提倡“达则兼善天下”的,因此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所遇到的最大困境是无法获得士人的广泛认同,这限制了其在中国上层社会中的传播。而宗杲在自己的禅学思想中公开提出“菩提心则忠义之心也,名异而体同”,则巧妙地调和了佛家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之间的矛盾,使佛徒的菩提心和儒家士大夫的忠义之心划上了等号,这是宗杲赢得一大批士人尊崇的重要原因。由于他把儒家的忠君爱国与佛家的菩提之心,入世与出世联系在一起,提倡入世即是出世,念佛是修行,从政爱民也是修行,敬佛是修行,忧国也是修行,正好契合了南宋士大夫的心境,从而突破了以往佛教所认为修行即不问世事的限制,感召士大夫们加倍地“爱君忧国”、抱持忠义之心。所以,不仅赢得了广大士人的好感,也得到了皇家的支持认可,宋高宗“赐郡田万亩”,宋孝宗赐“袈裟”,许其“舆前用青盖”,以至“言者列其宠遇太过”。^{[2](34)}

张孝祥是大慧宗杲的忠实拥护者,在宗杲面前谨守师徒之礼。从现存的史料和张孝祥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其对宗杲为人及其学说的信仰和崇拜。他在给宗杲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贤上人归,具书因循,久不嗣问,瞻仰良极。即日不审何如?伏惟于慈悲愿海为大津梁,清凉宝山,散甘露雨,有识无识,随见随闻,悉皆济度,悉皆解脱。弟子无缘顶礼,徒勤善颂,谨状。^{[8](376)}

张孝祥“为政平易,民咸思之”^{[2](71)},是一位忠君为民的士大夫,同时又是一位虔诚的禅宗信徒。多重身份,使他对宗杲的作为和禅学思想有着深刻的认同。由于张孝祥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参加科考并被宋高宗赵构亲擢为状元,使秦桧为其孙秦垵能状元及第而进行的种种布置全部落空,加之张孝祥及第后又积极为岳飞鸣冤、要求为其平反,因而招致了秦桧的嫉恨。其后,不但他自己屡遭秦桧一党的迫害,其父张昞也受其牵连而被诬下狱。而大慧宗杲作为秦桧政敌张九成的禅学导师,受到张九成的牵连而被流放南海,度牒也被剥夺。同遭迫害的境遇,使张孝祥

对宗杲的忠义之心和遭受流放后的坦然旷达的态度钦佩不已，他视宗杲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希望能从其禅学思想中获得安身立命的力量。此信正是写于秦桧已死，宗杲从梅州被放还之后。在此信中，张孝祥首先向历劫归来的宗杲，表达了深挚的崇仰之情，并盛赞宗杲历劫归来，必会以慈悲之心济度众生，使众生心灵有依，皆获解脱。最后他表达自己的遗憾，强调自己虽暂时无缘在宗杲跟前顶礼受戒，接受教诲，但是作为宗杲的弟子，当谨记宗杲的点引，一直心持善念，勤修佛法，勤颂佛偈，于日常生活中体悟佛家之至道。宗杲在《答张舍人状元安国》中，也娓娓而谈，集中阐述了自己的禅学要义。他说：

只以所疑底话头提管。……莫怕落空，这里却是好处。蓦然老鼠入牛角，便见倒断也。此事非难非易，除是夙曾种得般若种智之深，曾于无始旷大劫来，承事真善知识，熏习得正知正见，在灵识中，触境遇缘，于现行处，筑著磕著。……妙喜尝谓衲子辈说，世间工巧技艺，若无悟处，尚不得其妙，况欲脱生死，而只以口头说静，便要收杀。大似埋头向东走，欲取两边物。转求转远，转急转迟，此辈名为可怜愍者，教中谓之谤大般若断佛慧命人。……日用应缘处提撕，不要间断。古德有言，研穷至理，以悟为则。若说得天花乱坠，不悟总是痴狂外边走耳。勉之，不可忽。^{[7](447)}

在这封书信中，宗杲向张孝祥详细解说了自己的禅学主张。他的这段禅学解说，主要是针对北宋以来所流行的曹洞宗的默照禅有感而发。他鼓励张孝祥通过自性妙悟以达到真正解脱、最终成佛的境界。宗杲认为在修行的过程中，如不能破除妄执，达到自悟，则无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背诵多少佛教经典，终是无益的。要自心觉悟，当不离人间世，在“日用应缘处”体悟，他期待张孝祥在日常修行中得“正知正见”。

宗杲本人的人生态度就是随缘放旷、任性逍遥的，他后来被孝宗放还重新主持径山能仁寺时，脸上仍然留有刺配衡阳的墨记，他人以为不雅，“有劝之去其墨者，妙喜笑拒不答”^{[2](34)}，显示出了深厚的禅学修养和气度。他的这种超然随意的态度显然也影响到张孝祥，所以虽然仕途生涯坎坷，报国壮志难酬，但张孝祥的人生和作品中，却充斥着一种豁然达观的情绪。他虽终生未获大用，却始终能够抱持超然豁达的心境，以平静的态度看待人生的不幸。这种超脱达观的心境在他后期的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名作《念奴娇·过洞庭》曰：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

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9](1690)}

此词作于宋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八月中秋之前，距张孝祥过世还有三年。时年六月由于言官弹劾，张孝祥于六月落职返回寓居之地芜湖。在临近中秋的时候，他坐船途经洞庭湖，触景生情，遂有这首流传千古的名作。因为是其晚期作品，此词中渗透了张孝祥对禅学的体悟，其早年词作中洋溢的烟火之气已荡然无存了。“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明月、星河、湖水交相辉映，明亮皎洁透彻的物象映射出词人光明澄洁、随缘旷达的心灵世界。宇宙的奥秘、人生的真谛，均于此时豁然贯通，“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词作所呈现的空寂澄澈之境，正是宗杲所提倡的“触境遇缘”、自性妙悟的境界，许多人可能终身苦修，也无法达到，而张孝祥却于这样一个月明波静的夜晚，豁然心会。故此词境界之高，一向为人所称道，近人王闿运称其“飘飘有凌云之气，觉东坡水调有尘心”，^{[10](4295)}其誉不虚。

除了大慧宗杲，张孝祥还与临济宗的其它禅僧们交往密切。其中，比较知名的有应庵昙华、卮庵道颜等人。

应庵昙华是宗杲的同门虎丘绍隆禅师的法嗣，卮庵道颜则是宗杲的弟子。他们在当时也都是著名的大德高僧，其禅学体系和大慧宗杲是一脉相传。其中，昙华与宗杲被认为是同时代的“二甘露门”^{[11](244)}，据说大慧见到他的禅语之后“极口称叹”，并赠给他佛偈一首：“坐断金轮第一峰，千妖百怪尽潜踪。年来又得真消息，报道杨岐正脉通。”^{[11](244)}宗杲对昙华十分赞赏认为，他认为昙华与自己的禅学思想是相通的，都是属于禅宗的临济宗杨岐派的正脉主流。卮庵则是大慧宗杲的弟子道颜的法号，据说道颜先参圆悟，在圆悟还蜀后又依宗杲，最终获得真传。有人问他：“如何是法？”道颜回答：“黄绢幼妇，外孙齏臼。”^{[11](248)}其答语暗合于宗杲于日常生活中体悟的禅学宗旨。

在张孝祥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昙华、道颜等人的酬唱偈颂。在《卮庵赞》、《去年正月三日雪霁入昭亭访应庵如庵二老今年在临川追怀昔游用寄卮庵韵》、《卮庵自东林欲还蜀某以报恩招之大人赋诗劝请再次韵》、《用韵简天童应庵》、等诗文中，都可以见到他们彼此之间的酬唱、交往以及对禅学问题的探讨。可以看出，张孝祥对禅僧栖居的禅寺有着格外的爱好，

与这些高僧大德的交游成为他宦海生涯中的一件赏心乐事。他在给道颜所作的偈子中这样写道:

涉世须三洗骨, 忧时定九回肠。借我昭亭一榻, 伴师扫地添香。^{[8](312)}

作为一个希冀为国靖难、有所抱负的士大夫, 在满朝求和之声的朝廷中难以获得认同, 常常会感到“涉世”“忧时”的痛苦。因此, 他希望能从这些佛学的力量中获得慰藉, 这首诗充分表明了他对禅宗学说和禅僧生活的自觉向往和亲近。

二、

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层结构。每一家族, 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传统。个人成败固然事关家族的兴衰更替, 而家族的文化传统也必然对个体的成长和人格的建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宋代不仅是中国历史的转型时期, 同样也是家族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古以来的世家豪族此时已为科举时代新兴的士大夫家族所取代。

北宋灭亡以后, 大量的士大夫携其亲族逃往江南, 许多大族往往结族同居, 互通声息, 构建了自己的宗族文化。就在同一时期, 许多享誉士林的禅僧也都流亡到苏、浙、闽一带, 使东南一带佛刹林立, 禅风日炽。受到这种禅学氛围的影响, 佛教文化被许多士大夫家族所接纳, 成为其家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林济在《长江流域的宗族与宗族生活》一书中就特别指出:“宋元时期的宗族文化再创造又表现出佛教文化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特点。随着佛教的民间化发展, 唐宋以后形成了佛教与民间家族势力结合的趋势, 许多寺庵成为士大夫家族或富强家族的家族性寺庵, 寺庵成为其家族祖先崇拜的场所。”^{[12](101-102)}佛教与宗族势力结合在一起, 成为宋元以后宗族文化的一大特点。

张孝祥的家族就是这样一个以儒学传家、同时又兼取佛学的家族。张氏家族一方面以儒学作为自己家族发展的基础, 通过参加科举入仕来提升家族的地位; 另一方面又精研佛理, 通过禅学修身养性, 以禅宗教义来调剂身心, 以达到消释抑郁和烦恼, 求得心灵的安宁与清净的目的。对佛教的笃信, 无疑是张氏家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传统, 又对张孝祥思想的形成和人格的建构, 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张氏家族究竟从何时开始笃信佛教, 已不可确考, 但从张孝祥的父辈起, 其家族已对佛教有虔诚的信仰, 却是确定无疑的。对两宋之交的张氏家族来说, 张孝

祥的伯父张邵不但是其父辈中依靠科举而跃登龙门的第一人, 而且是推动家族发展和奠定家族传统的重要人物。张邵, 字才彦, 北宋徽宗朝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年科举中第, 使其家族由此步入了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家族的行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 “金人南侵, 诏求可至军前者, 邵慨然请行”^{[13](11555)}。张邵此次出使金国, 面对金军主帅挾据理力争, 触怒金人, 先后被囚于密州祚山砦和燕山之僧寺, 直到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年才返回南宋, 被囚时间达十四年之久。正是由于张邵主动应招出使金国, 被金人囚禁却坚贞不屈, 使得他的两个弟弟即张孝祥的父亲和叔父因朝廷推恩, 不通过科举即步入仕途。作为家族的骄傲、标尺, 张邵的为人、思想、言行及气节, 给其家族成员尤其是后辈以深刻影响。据《宋史·张邵传》的记载, 其“喜诵佛书, 虽异域不废”^{[13](11556-11557)}, 可见, 对佛教的信仰, 是张氏家族的传统, 诵读佛经, 是张邵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即使在囚禁于金国的十几年间, 这一传统和生活习惯也没有改变。在张邵人生面临困境的时刻, 正是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和从佛教中所汲取的力量, 支撑他度过了被金人拘囚的漫长岁月。

张孝祥家族笃信佛教的传统, 不仅在张邵的身上可以看到, 也体现在其家族其他成员的言行中。张孝祥的父亲、妻子、兄弟、姐妹, 也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 有的甚至虔诚到了舍弃世俗的生活、皈依佛门的程度。张孝祥的父亲张祁晚年“卜居芜湖, 晚嗜禅学, 号总得翁”, ^{[14](1359)}张孝祥在其所作的《和总得居士康乐亭韵》中, 极力推崇父亲的佛学修养:“先生义概云天薄, 千载参渠活句禅。”^{[8](71)}活句禅其实就是临济宗大慧宗杲等人所倡导的看话禅, 即以公案话头来开导众生, 以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可见, 张祁也是大慧宗杲的虔诚信徒, 信奉宗杲提倡的看话禅, 并以其作为自己修行体悟的方式。张孝祥的妻子时氏, 同样笃信佛教, 据张孝祥追忆, 其妻“奉佛素谨, 属纊而诵佛之声犹不绝”^{[8](347)}, 直至临终之时仍然口诵佛号不止, 其信仰佛教的虔诚自然不言而喻。张孝祥的弟弟张平国由于少时即受家族传统的影响, 发愿剃度为僧, 舍身敬佛。张孝祥在代父所作的《总得居士命作为平国弟剃度僧疏》中这样写道:

驹犊之爱, 已荷于等慈; 龙象之依, 尝深于夙愿。顾年龄之尚幼, 恐岁月之或淹。惟慧海师实平时之知旧, 而优婆塞自有生而熏修。度己度人, 是同是别。伏愿诸佛护念, 大众证明, 俾此善男子速证于菩提, 则我长头儿同增于福寿。^{[8](309)}

“优婆塞”是梵文 Upasakad 的音译, 意思是“清

信士”、“近善男”。在佛教中，通常是指亲近皈依三宝、接受五戒的在家修行的男居士，亦用来通称一切在家的佛教的男信徒。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张孝祥一家笃信佛教，都是在家修行的居士，平日与禅僧交往频繁。张孝祥的弟弟平国之出家，是“自有生而熏修”，由于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平日耳濡目染乃至水到渠成的结果。他所师事的禅师是慧海，而慧海禅师乃是张氏家族素所往来的高僧。因此，对于年幼的张平国出家为僧，家人尽管出于骨肉至情难免牵挂，却又都认为这是“度己度人”的善行，不但不加阻拦，反而都抱着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传统的中国伦理是推崇孝道的，至南宋特甚，而使家族血脉绵延久长，则被古人认为是孝道最主要的体现形式之一。在传统的家族中，男性通常都承担着维系家族血脉的责任。在这样一种伦理的制约下，张平国在尚未成年、也没有娶妻生子留下子嗣的情况下就剃度出家，假如没有家族成员的支持和赞同，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④[3](837)[15](427)。

由于禅宗特别是南宗提倡顿悟，其修行方式简便易行，一方面为许多士大夫寻求心灵皈依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亦使许多士人不用接受佛教清规戒律的束缚。在这一背景下，与许多士人接受禅宗思想、却不遵守佛家戒律和仪式不同的是，张孝祥的家族成员不仅信奉佛教学说，而且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表现出对佛家戒规和仪式的自觉遵从和笃行。在张孝祥的诗文中，仅是专门的佛家释语就有两卷之多，用于佛教仪式和表现佛教生活的诗文、佛偈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在同期的文人中是不多见的。他在《为第二妹设水陆疏右语》中说：

诸佛等慈，广有救援之路，众生诸恼，莫如疾病之侵。俯惟同气之微，偶愆勿药之喜。方输危惴，即底泰和，晓然梦寐之间，示之胎蚕之报。用亟修于净供，庶祇答于能仁。万劫狴牢，冀脱幽沉之苦；大千川陆，悉蕲悲乐之均。更哀佛力之无边，益侈家庭之后福。^{[8](308)}

“水陆”即指水陆道场，是佛教法会的一种。通常在水陆法会上，要由僧尼设坛诵经，礼佛拜忏，遍施饮食，以此来超度水陆一切亡灵，普济六道四生。张孝祥的二妹病愈后于梦寐中得佛祖开示，应将佛祖恩典普济四方。张孝祥此文即为此次水陆法会而作。在文中，张孝祥替其家族感谢佛祖保佑其二妹病愈，祈求佛祖能够以广大的法力救脱水陆众生摆脱苦海，并降福给自己的家人。

张孝祥不仅为自己的亲戚朋友，作了许多佛家的释语、偈子、铭文，而且将自己失意的病痛和怨苦也都寄望于佛教的拯救。他在为己所作的一篇《病愈答愿供佛道场疏》中这样祈求：

六道三涂，无非厉虐；十方诸佛，普示救援。载軫幻躯，夙依真谛，属有负薪之疾，愿荐伊蒲之羞。精神所加，昭应如答，未修报礼，每惕初心。惊半夜之钟，常交于梦寐；求三年之艾，又爽于节宣。用敬复于前言，以导迎于新社。

伏愿遍周沙界，悉坐道场，闻秘密言而除贪嗔痴，受甘露味而得戒定惠。使众生业障因法施而蠲除，则弟子沉痾，当不药而清愈。稽首阿难教，为我大医王。^{[8](306-307)}

一般说来，当人处于无法摆脱的困境和疾痛中时，往往不自觉从宗教的学说中寻求心灵的抚慰和解脱。在这一意义上看，禅宗与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有着相同的意义，都力图使人摆脱恐惧、忧苦、烦躁，达到内心的幸福安宁。弗洛姆在《禅宗的原理》一文中所认为的：“禅是洞察人生命本性的艺术；是从奴役到自由的一种道路；他释放我们自然的力量；它防止我们疯狂或畸形；而且它还使我们为快乐的爱而表现我们的天赋。”^{[16](137)}

由于病痛和失意，张孝祥尚处于人生壮年，就早早地致仕归隐。正是从禅中得到的力量，使他的心灵终得解脱和自在。

注释：

- ① 金人灭掉北宋以后，意欲劫持多位禅僧入北，也确实有许多北宋的禅僧入金，受到金人的尊奉。宗杲在北宋末已在禅林和士大夫中享有盛名，亦是劫持的对象。但宗杲却得他人帮助，想方设法逃往南方，这种作法和入金的许多禅僧还是不同的，显示了其在国破之际不肯从敌的气节和忠义之心。其事详见参考文献[3]。
- ② 此事亦见于《宋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三·张九成传》之记载：“径山僧宗杲善谈禅理，从游者众，九成时往来其间。桧恐其议己，令司谏詹大方论其与宗杲谤讪朝政。”详见参考文献[5]。
- ③ 朱熹与道谦、宗杲交往之详细考辨，可参见参考文献[6]。
- ④ 南宋时期人们对家族血脉的延续还是很看重的，甚至连那些出家的禅僧也不能例外。例如大慧宗杲十七岁出家。绍兴三十一年退位之后，曾到建康拜会重新被起复任用的张浚，他惋惜自己先人无后，故流着眼泪请求张浚，希望借助张浚之地位为自己的父亲寻找继承人、延续家族的血脉。张浚特为之一向朝廷奏请，表举其族弟为其父之后嗣。其事详见参考文献[3]、[15]。

参考文献：

- [1] 王质. 雪山集[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 [2] (宋)叶绍翁. 四朝闻见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3] 张浚. 大慧普觉禅师塔铭·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四十七[C]. 台北: 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 1990.
- [4] 释念常. 佛祖历代通载[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 [5] 宋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三·张九成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6] 束景南. 朱熹年谱长编·上卷[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7] 蕴闻. 禅宗语录辑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8] 张孝祥. 张孝祥诗文集[M]. 合肥: 黄山书社, 2001.
- [9] 唐圭璋. 全宋词[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0] 唐圭璋. 词话丛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1] 释如惺. 大明高僧传·1283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12] 林济. 长江流域的宗族与宗族生活[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13]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4] 黄宗羲. 宋元学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5] 杨曾文. 宋元禅宗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16] 弗洛姆, 铃木大拙, 马蒂诺. 禅宗与精神分析[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Zhang Xiao-xiang's Auspicious Zen Thought and Buddhist Origin

CHENG Chunxia

(College of Arts and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Zhang Xiao-xiang's ideology is absorbed in the aloof of Zen, which comes from two aspects. The first aspect is the Zenist atmosphere and Zen doctrine of Song dynasty. Zhang Xiao-xiang established a profound friendship with Zong Gao and he became of Zong Gao's follower. The Second, aspect is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 of his family. His family had the tradition of believing in the Buddhism. When he experienced misfortune, he used to get the strength of keeping aloof from Zen.

Key Words: Zhang Xiao-xiang; Zen Buddhism; ideology; origin; Zong Gao; family

[编辑: 颜关明]